

一、前言

《易經》自古以來一直被推崇為群經之首，古代帝王的統治、征戰，臣子的事君、奏議，百姓的日常生活無不與這部經典縷縷相繫。《易·繫辭傳》云：「夫易，廣矣、大矣！」¹、「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²、《易緯乾鑿度》說《易》有三義：「簡易」、「變易」、「不易」³，《易經》深邃而取用不竭的人生智慧超越了原始的卜問，達到一種「通德類情」⁴的天地人合和的境界。

《易經》對中國而言，媲美於西方的聖經，作為一部哲學性如此高的經典，西方不乏對它的研究：十七世紀初法國傳教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於一六二六年，在杭州時，將《易經》翻譯成拉丁文，這是西方語言最早的《易經》翻譯。一七五零年法國傳教士宋君榮(Antoine Gaubil, 1689-1759)始有法文翻譯；一八八九年比利時人哈雷茲(Charles de Harlez, 1832-1899)在布魯塞爾出版的《易經》，影響至今，為西方通用的法文本。德國思想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6)以他發明的「二元算數」對應伏羲的易圖做二進位解說。《易經》第一本英文版是英國傳教士麥格基(Thomas McClatchie, 1813-1885)於一八七六年譯出，但該譯文品質欠妥，較不為西方學者採用。⁵到了十九世紀英國學者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將《易經》翻譯為英語，一八八二年出版，為《易經》譯本開始以西方現代語言呈現之代表作，此譯本並非直譯本，但附有註腳(footnotes)有益英語讀者之理解，當時在西歐被認為最理想、最有影響的英譯本。⁶二十世紀德國教士和學者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德文譯本注重對《易經》的哲學理解和對中國古代思想的解釋；此德文譯本於一九四九年再經其子衛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的協助，由貝內斯(Cary Baynes, 1883-1997)轉譯為英文，一九五〇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以來，再版不斷，成為當今西方英語國家

¹《易·繫辭傳上六》：「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²《易·繫辭傳上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

³《易緯乾鑿度》，從易學史上看，可以說是漢易的〈繫辭傳〉，即漢代易學通論。它開始便對「易」作了解釋，提出「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三義，即簡易、變易、和不易。(見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臺北市：藍燈文化，1991年)頁182-183。)

⁴《易·繫辭傳下二》：「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⁵見趙曉陽：〈傳教士與中國國學的翻譯——以《四書》《五經》為中心〉，《中國近代研究》，2005年09月14日，閱網2015年5月31日，〈<http://jds.cass.cn/Item/433.aspx>〉。

⁶James, Legge. *The Book of Changes*. (Lavergne, TN: March 09, 2015/ CPSIA: LVOW03s0407090315).

所通用的「標準譯本」；此譯本的受眾，不僅針對專家，更考量一般讀者。⁷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 Jung, 1875-1961) 以文化心理學來研究《易經》，並以一位受過現代西方科學「成因關係」(causality)訓練的心理醫師觀點，親身兩次問卦所得的回應來診斷《易經》，榮格認為《易經》對詢問者身處的場景(situation)，給予的回答算是「神智正常」(of sound mind)。⁸

爾後，英文研究《易經》，無論義理探討或占卜，大抵都以衛禮賢/貝內斯的英譯本和詮釋為依據，例如，克禮履(Thomas Cleary)的《易經：變書：全文翻譯》(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 A Complete & Unabridged Translation)⁹、禮則碼和卡徹(Rudolf Ritsema and Stephen Karcher) 的義大利文《易經》(The I Ching)¹⁰、Carol K. Anthony 的《易經指南》(A Guide to The I Ching)，此書針對衛禮賢英譯本作詮釋導讀。¹¹ Brian Browne Walker 的《易經》(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著眼於易經占卜功能，對每個卦爻辭的詮釋已非《周易》原文，而是衍生義。¹² 近年澳洲漢學家閔福德(John Minford)針對「非學術、專家的」的方外「讀者」(the lay reader)、以「簡單無華的用語」詮釋並譯解《易經》(I Ching) 等等¹³，可謂不一而足。

值得一提的英譯版本為黃濬思(Alfred Huang)英譯的《易經全集》(The Complete I Ching)，內含孔子《十翼》(Ten Wings)的英文翻譯。¹⁴ 黃濬思是一位華裔，在歷經文革的磨難，監禁了二十二年，於一九八〇年代移民美國，深研易經與道家哲學，公元二千年他高齡九十，出版這本《易經全本》英譯。他的朋友稱許並期望它成為繼衛禮賢標準本之後，下一個五十年的標準本。¹⁵

黃濬思研讀周朝歷史後發現，周文王是以「天人合一哲學」(philosophy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來寫卦辭的內容，因此他據此基礎來決定每一個英文卦名；¹⁶如第

⁷ Wilhelm/ Baynes, "Translator's Notes" i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xl.

⁸ Carl G. Jung, "Foreword" i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trans. Wilhelm/ Baynes, 1997, p. xxxvii.

⁹ Thomas Cleary,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 A Complete & Unabridged Translation* (Boston & Lond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1992).

¹⁰ Rudolf Ritsema and Stephen Karcher, *I Ching*. (New York: Element Books Ltd., 1994).

¹¹ Carol K. Anthony, *A Guide to The I Ching*. (Massachusetts: Anthony Publishing Co., Inc., 1988).

¹² Brian Browne Walker,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¹³ John Minford, *I Ching: The Essential Transl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Oracle and Book of Wisdom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Viking, the Penguin Group, 2014) 502.

¹⁴ Alfred Huang, *The Complete I Ching*. (Rochester& Toronto: Inner Traditions com., 2010).

¹⁵ Alfred Huang, "Acknowledgments" in *The Complete I Ching*, p. xiii.

¹⁶ Alfred Huan Acknowledgments and preface g, "Ten Contributions of This Translation" in *The Complete I Ching*, p. xxii-xxiii.

一卦「乾」譯為“Initiating”，第二卦「坤」譯為“Responding”，第三卦「屯」譯為“Beginning”。他以「不能孤立看卦名，要從其整體內容的排列次序來思考。」，跳脫衛禮賢/貝內斯將第一卦「乾」譯為“The Creative”，第二卦「坤」譯為“The Receptive”，第三卦「屯」譯為“Difficulty at the Beginning”的譯法。黃濬思自認衛禮賢/貝內斯的英譯本《易經》對他影響很大，但覺得理雅各和衛禮賢「兩人都不懂六十四卦代表著六十四種不同階段卻又相關聯、互為起落的循環變化結構。」，舉第三卦「屯」為例證，在「乾」與「坤」的陰陽結合完成「創造」之後，按中國人的宇宙生成觀點「一生二，三生三，三生萬物」，接下來應該是「正面的意義」，而且《周易》的卦辭也給了「吉」象，並未像衛禮賢/貝內斯的第三卦「屯」英譯文所呈現的「困難」情境；因此黃濬思說：「此非中國式思想」(This is not the Chinese way of thinking)。¹⁷ 黃濬思雖然不是翻譯理論家，但是從他如何去實踐，把第三卦「屯」，譯為“Beginning”的思惟，事實地印證了翻譯學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在施語(the source language)和受語(the target language)之間，處理符號轉換時，譯者在不同的時空下，做了特定族群的思惟和行為的常態規範(norms)之選擇。描述翻譯學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先驅，以色列翻譯學教授圖理(Gideon Toury, 1942-)所揭出的「翻譯是一種常規制約活動」(translation as a norm-governed activity)，翻譯者必須在「施語常規」(source norms)和「受語常規」(target norms)之間作抉擇，因為這會導致翻譯文本的「適切性」(adequacy)和「可接受度」(acceptability)的評量；所謂「譯文常規」(translation norms)，就是讀者依其生活的文化內涵(the persons-in-the-culture)窺知潛藏在受語裏的文化或行為常規，得知翻譯者所採取的翻譯策略抉擇。¹⁸

二十世紀以來，《易經》逐漸在歐美世界流行，成為西方了解東方文化的鑰匙。¹⁹ 其中衛禮賢/貝內斯的英譯本最為歐美國學術界所推崇，可謂是西方公認的標準本。吳怡在《易經繫辭解義》自序中也提及衛禮賢/貝內斯的英譯本：「在美國，衛禮賢的《易經》譯本已成經典之作，熱愛東方學的人士，幾乎人手一冊，該書就是以《伊川易傳》和《周易折中》為藍本。」²⁰ 衛禮賢/貝內斯的《易經》英譯本也為荷蘭萊頓大學漢學中心採

¹⁷ Alfred Huang, “Ten Contributions of This Translation” in *The Complete I Ching*, p. xxi-xxii.

¹⁸ Gideon Toury,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orms in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4) 205-218.

¹⁹ 見成中英：〈國際《易經》研究：回顧與展望〉《易學本體論》(臺北縣：康德，2008年)，頁216-226。

²⁰ 見吳怡：《易經繫辭傳解義》(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頁2。

用。²¹ 可見衛禮賢/貝內斯的《易經》譯本對西方學界的影響，既然如此，這本英譯本就值得檢證。

余光中為國內翻譯名家，他曾說：「譯者日與偉大的心靈為伍，見賢思齊，當其意會筆到，每能超凡入聖，成為神之巫師，天才之代言人。」²² 並認為譯者是不寫論文的學者，沒有創作的作家，卻擅於運用語文，出入作品，盡窺其妙而運用自如，影響力未必小於作者。他推崇譯者、重視翻譯，可見一斑。余光中的翻譯作品有《梵谷傳》、《理想丈夫》、《不可兒戲》、《溫夫人的扇子》、《不要緊的女人》、《老人和大海》、《英美現代詩選》、《守夜人》、《濟慈名著譯述》等，誠如他書中提及：「一個人的翻譯，其實就是他自己翻譯理論不落言詮的實踐，正如一個人的創作裏其實就隱藏了自己的文學觀。」²³ 因之，透過這些作品，不難尋覓他翻譯理論與實踐的蛛絲馬跡；而《余光中談翻譯》、《含英吐華—梁實秋翻譯獎評語集》和《舉杯向天笑》這三本書更是他翻譯理論的菁華。

本文即以余光中的在上述文集中提到的翻譯理論透過四個面向(一)施語與受語之間的語法差異(二)最佳字句最佳次序(三)直譯與意譯(四)自揚漢聲，來印證衛禮賢英譯本當中的〈既濟〉、〈未濟〉二卦。務期在《易經》英譯這一方園地，貢獻足資參考借鏡的示範，以建立國人自譯古典經學的品牌並開枝散葉。

二、施語與受語之間的語法差異

余光中在〈作者、學者、譯者〉一文中認為成就一位稱職的譯者，該有三個條件。第一，對於「施語」(source language)的體貼入微，還包括了解施語所屬的文化與社會。第二，對於「受語」(target language)的運用自如，還得包括各種文體的掌握。第三，對於「施語」原文所涉的學問，要有相當的熟悉。第一個條件近於學者，第二條件近於作家，第三個條件更近於學者了。²⁴

衛禮賢在中國居住二十五年，擔任傳教士、德國駐華使館文化參贊，精通漢學，先

²¹ 臺大鄭吉雄教授於2011年12月8日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學所演講〈從古史辨運動中的中日學術關係講到《易經》與《易傳》的哲學〉，演講中提到他在荷蘭萊頓大學講授《易經》，即以衛禮賢/貝內斯的譯本為教本。

²² 見余光中：《余光中談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扉頁。

²³ 見余光中：〈翻譯之教育與反教育〉，《余光中談翻譯》，頁196。此篇文章後來收入臺北市九歌出版社2008年發行之《舉杯向天笑》，頁112。

²⁴ 余光中：〈作者、學者、譯者〉，《余光中談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頁172。

後翻譯多本儒道經典，曾受聘為北大教授，並與當時中國知名學者勞乃宣(1844-1927)、胡適(1891-1962)等人交遊，在精研易學的勞乃宣協助下，花了十年功夫將《易經》譯成德文。²⁵除了這些外在的背景外，可由衛禮賢在此書的〈緒言〉(Introduction)中所顯示的重要內容來判斷他對易學的了解程度：第一、《易經》解釋的基本準則：衛禮賢認為「要依據《易經》的內容和時代背景」及「去除一些外加物，還原《易經》的真面目。」第二、衛禮賢清楚掌握八卦的象徵演變：從伏羲時代表天地循環變化之象，演進到也象徵中國家庭的抽象功能結構。第三、易卦中陰陽爻的理解：每一爻都會變，隨之影響到整體情境的改變；依宇宙之道而變；易卦的精神不是靜待命運(fate)的來臨，而是人本身應道知「要怎麼做」(What am I to do?)，而且《易經》也賦予各人修身之參考，因此《易經》實為「一部智慧之書」，非只是「卜筮之書」。第四、影響《易經》詮釋的背景：衛禮賢清楚地認識到後代人對《易經》的詮釋受《大學》和《中庸》影響甚大。第五、《易經》版本的選擇：衛禮賢選用了康熙欽定的大學士李光地所撰《周易折中》為原文範本，所謂「折中」即兼採宋代程頤、朱熹的《易經》注疏—《易程傳》、《周易本義》，再加上李光地自己的按語。此乃本論文所採用的漢文版本。²⁶上述學識與考量已可證明衛禮賢是一位稱職的易學專家，符合了余光中所謂「稱職的譯者」三個條件之「了解施語所屬的文化與社會」，及「熟悉施語原文所涉的學問」。

至於第二個條件「對於受語的掌握」，由於衛禮賢的譯本為德文，筆者所探討的英譯本為美國學者貝內斯女士所轉譯，貝內斯得到心理學大師榮格的推薦翻譯《易經》又有衛禮賢之子衛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的協助。而衛德明除了家學淵源，熟悉漢語外，對《易經》中有關〈文言〉和〈說卦〉可能成書在孔子年代之前有所考證，降自現代學者郭沫若在共產大陸意識型態壓迫下研究易經的狀態、以及海內外新出土的研究資料都有涉獵。另外，對於《易經》文體的掌握，衛德明認為「雜卦、小象還有爻辭等都是一首完整的詩篇，為有系統的韻律結構。」²⁷此觀點與今日旅美道學大師黃濬思的見識一致：黃濬思分析《易經》卦辭和爻辭裡使用的明喻、暗喻、寓言、象徵等意象語言和修辭表達後，就直言：「《易經》是一部詩作，不是散文。」²⁸可見以衛德明的漢

²⁵ 見賴貴三：〈易學東西譯解同〉，(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16期，2014年9月)，頁37。

²⁶ Richard Wilhelm, "Introduction" i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by Wilhelm/ Baynes, p. xlvii-lxii.

²⁷ Hellmut Wilhelm, "Preface to the Third Edition" i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by Wilhelm/ Baynes, p. xiii-xx.

²⁸ Alfred Hua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The Complete I Ching* (Rochester and Toronto: Inner Traditions, 2010) xxvii.

語能力及漢文化思惟的認知來從事《易經》的譯注，也能實踐圖理(Toury)所揭示的「譯文常規」(translation norms)之要求。因此，由衛德明與貝內斯女士彼此合作²⁹，做為譯者對受語掌握與運用自如的要求，自然也不成問題。此種《易經》的轉譯過程已經造成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貝內斯的《易經》英文譯本雖然以德文為基礎，但是衛禮賢父子又都精通漢語，由衛禮賢之子衛德明親自協助貝內斯女士，其實，漢語已成了德文譯本的「潛在的原文」了。

以英譯來看，所謂施語 (source language) 即漢文原文，所謂受語 (target language) 即英文譯文，施語與受語之間的語法差異即漢英文之間的語法差異。余光中在《余光中談翻譯》，一書中指出多個中英文語法差異點，筆者將之歸納如下：

(一) 中文文法彈性非常大，絕少因文法而引起的字形變化，可以說是 inflection-free 或者 non-inflectional。中文的文法中沒有英文在數量 (number)、時態 (tense)、語態 (voice) 和性別 (gender) 各方面的字形變化，單音的中文字在變換詞性的時候，並不需要改變字形。³⁰

(二) 中文的名詞和動詞完全不理會什麼單數複數，來去毫無牽掛。中文陰陽不分，古今同在，眾寡通融，真是了無絆碍。³¹ 西方語言最可怕的莫過於動詞，這麼苛分動詞的時態，很可能是因為西方文化以時間觀念為主。³²

(三) 英文文法中不可或缺的主詞與動詞，在中文裏往往可以省去。綴繫動詞 (linking verb) 在中文往往是不必要的。中文本來就沒有冠詞也省去了前置詞、連接詞以及 (受格與所有格的) 代名詞。面臨翻譯時，名詞是單數還是多數？主詞應該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動詞時態該是過去呢還是現在？³³

(四) 措詞簡潔、語法對稱、句法對稱、句式活、聲調鏗鏘，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態。³⁴ 英文好用抽象名詞，軟化了動詞，也可以說是架空了動詞。現代英文喜歡化簡為繁、化動為靜、化具體為抽象、化直接為迂迴，到了名詞成災 (non-plague) 的地步。³⁵ (五) 在英文裏，詞性相同的字眼常用 and 來連接。但在中文裏，類似的場合往往不用連接詞。

²⁹ 見賴貴三：〈易學東西譯解同〉，頁 39。

³⁰ 見余光中：〈中西文學之比較〉，《余光中談翻譯》，頁 17-18。

³¹ 見余光中：〈橫行的洋文〉，《余光中談翻譯》，頁 146。

³² 見余光中：〈橫行的洋文〉，《余光中談翻譯》，頁 143。

³³ 見余光中：〈中西文學之比較〉，《余光中談翻譯》，頁 18-20。

³⁴ 見余光中：〈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余光中談翻譯》，頁 151。

³⁵ 見余光中：〈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余光中談翻譯》，頁 153-154。

(六) 介詞在英文裏的用途遠比中文裏重要，簡直成了英文的潤滑劑。英文的不及物動詞加上介詞，往往變成了及物動詞，例如 Look after, take in 皆是。介詞片語(prepositional phrase)可當作形容或助詞使用，例如: friend in need, said it in earnest。所以英文簡直離不了介詞。中文則不盡然，「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兩個片語不用一個介詞，換了英文，非用不可。³⁷

(七) 英文的副詞形式「地」對中文為害尚不顯著，但也已經開始了。³⁸

(八) 白話文一用到形容詞，似乎就離不開「的」，簡直無「的」不成句了。在白話文裏這「的」字成了形容詞除不掉的尾巴。在英文裏，形容詞常用的語尾有-tive, -able, -ical, -ous 等多種，不像在中文裏全由「的」來担任。³⁹

(九) 動詞是英文文法的是非之地，多少糾紛都是動詞惹出來的。中文的名詞不分單複與陰陽，動詞也不變時態，不知省了多少麻煩。動詞西化的危機有兩端：1. 弱動詞＋抽象名詞 2. 被動語氣，凡是及物動詞，莫不發於施者而及於受者。目前中文的被動語氣有兩個毛病：一個是用生硬的被動語氣來取代自然的主動語氣，另一個是千篇一律只會用「被」字。⁴⁰

(十) 施語與受語相通之處，不妨「直譯」，而相悖之處，則可「意譯」。⁴¹

衛禮賢的兒子衛明德在一九六八年此英譯本再版時，拒絕了編輯的構想--為非中文讀者(the non-Chinese reader)考量而重新安排此書內容的要求，⁴² 由此可見衛禮賢父子對漢文原味的堅持。依余光中的中英文語法比較觀點來檢視衛禮賢/ 貝內斯《易經》英譯本所呈現的現象，現以〈既濟〉和〈未濟〉兩卦卦辭(The Judgment)英譯為例說明如下：

既濟 ☵☲ 卦辭：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⁴³

³⁶ 見余光中：〈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余光中談翻譯》，頁 159。

³⁷ 見余光中：〈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余光中談翻譯》，頁 160。

³⁸ 見余光中：〈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余光中談翻譯》，頁 161。

³⁹ 見余光中：〈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余光中談翻譯》，頁 162。

⁴⁰ 見余光中：〈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余光中談翻譯》，頁 166。

⁴¹ 見余光中：〈翻譯之教育與反教育〉，《余光中談翻譯》，頁 198。此篇文章後來收入臺北市九歌出版社 2008 年發行之《舉杯向天笑》，頁 114。

⁴² Hellmut Wilhelm, "Preface to the Third Edition" in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by Wilhelm/ Baynes, p. xvii.

⁴³ 見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臺南：中華易道心法文化協會出版，2008 年)，頁 906。

THE JUDGMENT

AFTER COMPLETION. Success in small matters.

Perseverance furthers.

At the beginning good fortune.

At the end disorder.⁴⁴

卦辭精簡、對稱、活力是漢文尤其是古文的特色，似古代的二言詩，不但言簡意賅，還具有詩行似的對仗（初對終，吉對亂；濟和吉押尾韻），充分體現漢語言的韻律與美感。衛禮賢/貝內斯譯本為了如實翻譯，已朝向原文的簡明（concise）方向，並保留原文四行形式，然而卦辭產生於三千多年前的西周，衛禮賢/貝內斯的英譯本出版於上世紀五〇年代，距今不到百年，古文與現代文的差距本不可同日而語，何況又是語系完全不同的中英文？譯文“Success in small matters”裏省略了動詞，“At the beginning good fortune, At the end disorder.”裏不但省略了動詞，還「初(the beginning)、終(the end)」語意對仗，並且“disorder”又跟“Perseverance furthers”和“matters”的“er”押半韻，表現出詩歌的特色。雖然英譯文中即使省略主詞、省略關係代名詞、省略連接詞等等，其所呈現的文字字數仍比原來的漢文多上一倍。當然中英文語法的差異在此明顯又突出，如英文的名詞 matters 是複數形式，動詞 furthers 有時態的變化，中文是不理會動詞、名詞變化的；中文簡單一、兩個字，英文要用介詞片語來形成，如“in small matters”（小）、“At the beginning”（初）、“At the end”（終）等。此英譯的風格對等了余光中所前述：「措詞簡潔、語法對稱、句法對稱、句式活、聲調鏗鏘，這些都是中文生命的常態。」和「中文的名詞不分單複與陰陽，動詞也不變時態」的特性；同時也顯現出「介詞在英文裏的用途遠比中文裏重要，簡直成了英文的潤滑劑。」

再看一段〈未濟〉卦：

未濟☵☲卦辭：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⁴⁵

THE JUDGMENT

BEFORE COMPLETION. Success.

⁴⁴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710。

⁴⁵ 見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頁 917。

But if the little fox, after nearly completing the crossing,
Gets his tail in the water,
There is nothing that would further.⁴⁶

英譯仍然是四行形式。內在音律和字尾押韻也頗和諧；例如“water”與“further”押尾韻“er”對等於漢語原文的「濟」與「利」；“success”和“fox”有子音“s”相應；“little”跟“nearly”有“li”和“ly”的半協韻；“completing”與“crossing”共享“ing”尾韻，能凸顯卦辭為詩文的特質。原文出現的意象名詞「小狐」，「汔濟」、「濡其尾」都能保留且很簡潔地，以一個主詞「小狐」加上兩個連續的動詞「濟」和「濡」，再加上個受詞「尾」，刻劃那隻小狐的動作，只用一個副詞「汔」表示「將近」的意思，漢語「連動句」⁴⁷的自由、流暢可以顯見。現代英文在表達這些動作時，除了主詞“little fox”和動詞外，還需連接詞“But”來轉折、“if”設定條件、介詞片詞“after nearly completing the crossing”表示時間狀態、“in the water”點明空間處境、關係代名詞“that”引導形容子句。而動詞時態的變化，原文沒有，卻是譯文免不了的，如“gets”、“There is”。且動詞因介係詞“after”的關係弱化變成動名詞，如“completing”、“the crossing”。

語言學界一般認為「英語的語法結構以『行合』(hypotaxis)為特點，哪個成分同哪個成分有關聯，一般都能從形態上看出。漢語則以『意合』(parataxis)為特點，兩成分間的關係往往要靠上下文思來判別，而當某個成分(經常是主語)省略時就更要靠上下文，以至於言外知識來找出正確的主謂關係了。」⁴⁸，因此從卦辭的漢語結構上看，主詞「小狐」能同時帶兩個動詞「濟」、「濡」和受詞「尾」，是為「連動句」；「濟」、「濡」兩個動詞發生的時間，有前後次序。為何此句漢語比英語簡潔的原因在於動詞的含意，漢字「濟」部首為「水」，於是它就內存「渡/涉/通過」與「水」的兩個語意；外加「濟」在中國古代也是一條河的名稱，是以「渡河」的意象非常清楚。英文字動詞“cross”(過)可指涉的範疇很廣，可以穿過街道，通過樹叢，過河，穿過天空等等，所以後頭必須給一個明確的「位置」，就必須出現“water”(水)。即使衛禮賢/貝內斯的譯文“in the water”(水裡)仍欠精準，宜譯為“in the river”(河裡)；而且“river”與“further”也一樣押尾韻“er”。

⁴⁶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715。

⁴⁷ 見胡裕樹主編：〈詞組和句法分析〉，《現代漢語》，重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頁303。
「連動詞組/句」：兩個以上的動詞連用，它們之間沒有主謂[主語+動詞+受詞/補語]、聯合、動賓、偏正、補充等關係。

⁴⁸ 見柯平編著：〈翻譯的過程〉，《英漢與漢英翻譯》，(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6年)，頁62。

再者，英文裏需要有設定條件的连接詞(conjunction)，像“if”；表達情境轉折的字，如“but”等，但是在漢語裏，如前所述的特色，「漢語則以『意合』，兩成分間的關係往往要靠上下文思來判別，而當某個成分省略時就更要靠上下文，以至於言外知識來找出正確的主謂關係了。」因此，「未濟」卦辭帶有條件的情境是漢語讀者能「無言而能理解」(understood)的內鍵結構。英語裏既然有了帶條件的连接詞引領得從屬子句“if the little fox, . . . Gets his tail in the water,”，那麼就必然要出現主要子句 “There is nothing that would further.”，才算結構完整。

余光中說：「介詞在英文裏的用途遠比中文裏重要，簡直成了英文的潤滑劑。」此卦的英譯也出現了介詞片語，如 “after nearly completing the crossing”和 “in the water”，它們的出現是英語結構使然，前者是為了準確反應時間前後的觀念，後者是要點出情境發生的位置；但這些在以『意合』的漢語裏，都是「無言而能理解」(understood)的。此等中英文語法不同的比較現象，恰恰反映在這施語與受語的文本上，透過檢視與比對，更能清楚二者之間的差異。此英譯落實了余光中所言：「現代英文喜歡化簡為繁、化動為靜、化具體為抽象、化直接為迂迴。」

三、最佳字句最佳次序

余光中在〈翻譯與創作〉一文中談到——在譯文中要講究字句的次序，所謂「最佳字句排最佳次序」的要求，不但可以用於創作，抑且必須期之於翻譯。⁴⁹ 他又表示——中英文兩種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辭、思考習慣、美感經驗、文化背景上既如此相異，字、詞、句之間就很少現成的對譯法則可循。⁵⁰

在〈與王爾德拔河記〉一文中余光中也說——遇見長句時，譯者要解決的難題，往往首在句法，而後才是詞語。對付繁複長句之道，不一而足，有時需要拆開重拼，有時需要首尾易位。一般譯者只知順譯（即依照原文次序），而不知道逆譯才像中文，才有力。⁵¹ 同樣的處理英文句構的經驗亦見諸於嚴復的〈天演論譯例言〉：「故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

⁴⁹見余光中：〈翻譯與創作〉，《余光中談翻譯》，頁 34。

⁵⁰見余光中：〈翻譯與創作〉，《余光中談翻譯》，頁 37。

⁵¹見余光中：〈與王爾德拔河記〉，《余光中談翻譯》，頁 128。

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為譯，則恐必不可通。」⁵²

中英文在字句上的次序往往不同，翻譯時如何選擇最佳的字句次序，即順譯或逆譯，是一大問題。衛禮賢英譯本在〈既濟〉、〈未濟〉二卦的譯文上多數採順譯方式，可以說是遷就了中文原文的語法、句式；然亦有逆譯方式以貼近英文表達的習慣，符合了「最佳字句排最佳次序」的要求。援引〈既濟〉六四、九五和〈未濟〉上九爻辭(the Lines)為例。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⁵³ (〈既濟〉 )

Six in the fourth place:

The finest clothes turn to rags.

Be careful all day long.⁵⁴

衛禮賢/貝內斯的譯文為“The finest clothes turn to rags.”「繻」在漢語裏可為「彩色絲織」，它的英譯應為“The dyed silk clothes”。這句話的意象「美好的絲綢變成了破布」暗示著「由好到壞」的過程，是以提出了「終日要戒慎」的警告。衛禮賢/貝內斯的譯法為「順譯」。《周易折中》各家注解「繻」當作「濡」，沾濕、滲漏的意思。⁵⁵「袽」，敗絮，指破敝的衣服。「繻有衣袽」，指船漏有破衣敗絮來堵塞。借喻此六四爻辭能思患而預防。⁵⁶ 先輩理雅各(James Legge)依《周易折中》的說法，他的詮釋如下：“The fourth Six, divided, shows its subject with rags provided against any leak (in his boat), and on his guard all day long.”⁵⁷指的也是「船有漏，有破布」的意象；閔福德(John Minford)基本上跟著衛禮賢/貝內斯，他的譯文為“Fine clothes/ Turn to rags.”⁵⁸「美好的絲綢變成了破布」；而《周易折中》各家注解較符推理，因為這個卦是建立在「渡水」的情境上。不過，衛禮賢/貝內斯在此爻的說明文裏提到宋代程頤採用了「船」的意象，並將之譯為“It has a leak,

⁵² 見嚴復，〈天演論譯例言〉，《翻譯論集》，劉靖之編（臺北：書林出版社，1995年），頁1。

⁵³ 見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頁913。

⁵⁴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712。

⁵⁵ 參見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臺南：中華易道心法文化協會出版，2008年），頁913。

⁵⁶ 見黃忠天：《周易程傳註評》（高雄：復文出版，2006年），頁552-553。

⁵⁷ James, Legge. *The Book of Changes*, p. 121.

⁵⁸ John Minford, “Book of Wisdom” in *I Ching: The Essential Transl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Oracle and Book of Wisdom*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p. 487.

but there are rags for plugging it up.”⁵⁹ (它[船]有漏，但有破布可塞。)，可見衛禮賢/貝內斯也留意到別家的注解，只是他們做了自己的選擇。此處英譯文為「順譯」與漢語次序同，但多帶個對等連接詞 “But” 表達轉折語調。黃濬思也將此句譯為 “Caulking the leak,/ There are rags.”⁶⁰ (封漏，有破布)。至於「終日戒」英譯為 “Be careful all day long.” 相對於漢文句構，它是「逆譯」，卻是符合英文語的「最佳字句排最佳次序。」

以另一爻辭為例：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⁶¹ (〈既濟〉 )

Nine in the fifth place:

The neighbor in the east whoslaughters an ox

Does not attain as muchreal happiness

As the neighbor in the west

With his small offering.⁶²

九五譯文是個很好的例子。「殺牛」是厚祭，「禴祭」是薄祭，意思是當「既濟」時，驕奢易萌而誠敬必不足。如是，「東鄰」厚祭反不如「西鄰」薄祭獲得神明賜福。⁶³ 原文「東鄰」(eastern neighbor)、「西鄰」(western neighbor)都是用「表方位的形容詞加上名詞」，但衛禮賢/貝內斯英譯文卻在後面放了表方位的介系詞片語來界定前面的名詞“in the east”對仗 “in the west”，此例印證了余光中先前提到的「介詞在英文裏的用途遠比中文裏重要，簡直成了英文的潤滑劑。」不過“in the east”對仗 “in the west”，仍不乏詩韻之美。在表示比較的結構上，漢語用「不如」二字連接前後兩個相比的事項，亦精確，英語必須用 “not . . . as much . . . as” 較為冗長的結構來比較前後兩個事項。原文九五爻辭是三句組成，英譯文分四行表示，但實際上卻只是一個複合句 (complex sentence)，它帶有限定性形容詞的從屬子句 “who slaughters an ox”，因而拉長了英語的句構，不似漢語精簡。至於「實受其福」，是此爻表達「後果」的一個句子，如果把此漢語句看成是獨

⁵⁹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712-13。

⁶⁰ Alfred Huang, *The Complete I Ching*, p. 487-88.

⁶¹ 見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頁 914。

⁶²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713。

⁶³ 見黃忠天：《周易程傳註評》，頁 553-554。

立的句子，它省略掉一個主詞「西鄰」或其代名詞「他」；或可英譯為“The western neighbor/he/ attains real happiness.”但是若採用人稱代名詞“who”，把這句譯成“who attains real happiness.”那麼這個「實受其福」就變成形容詞子句(adjective clause)，修飾前面的「西鄰」。衛禮賢/貝內斯英譯此爻辭基本上跟隨著理雅各所使用的句型。⁶⁴ 比較黃濬思的譯文，加了對比轉折詞“but”，也採用了比較結構“as much... as”，但是他用“the eastern neighbor”和“the western neighbor”，不但符合漢語原文，也顯得簡潔；⁶⁵ 而閔福德雖然也使用英語人士喜歡用的介詞片語，來指出人的方位“Neighbors to the East”和“Neighbors to the West”，但他的句子都是簡單的「主詞+動詞+受詞」，沒有加比較詞“not... as much... as”，僅用了比較級的最簡單模式「形容詞+er」(greater)；也沒有托出“who”的子句，以此來表現漢語精鍊的特色。閔福德譯文如下：

Neighbors to the East
Slaughter an ox.
Neighbors to the West
Perform a simple Yue Sacrifice.
The Blessing
Is greater
*Felicitas.*⁶⁶

閔福德此段譯文展示了英語名詞表示數量的特色，他把「東/西鄰人」用複數形“neighbors”來處理，他顯然認為殺牛可能不是一個人所能為，或者是「東/西鄰人」泛指當地民眾的共同文化行為。另外，古代春夏祭祀的「禴」禮，他以漢語拼音“Yue”的專有名詞，配上斜體字形來表示。最後，用拉丁字源的“*Felicitas*”來搭配，是回應小象辭「吉大來也。」。而閔福德若把介系詞方位語“to the East”和“to the West”省略掉，改換成“the eastern neighbor”和“the western neighbor,”將更符合古漢語的簡潔。翻譯過程中，句子重新編排讓中英文各得其所，乃翻譯者對施語和受語各自文化規範的判斷和抉擇，所謂的「譯文常規」之實踐。凡此經營皆期望達成「最佳字句排最佳次序」的效果。

⁶⁴ James, Legge. *The Book of Changes*, p. 122.

⁶⁵ Alfred Huang, *The Complete I Ching*, p. 488.

⁶⁶ John Minford, “Book of Wisdom” in *I Ching: The Essential Transl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Oracle and Book of Wisdom*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p. 487.

再舉另一爻辭來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⁶⁷（〈未濟〉䷿）

Nine at the top:

There is drinking of wine

In genuine confidence. No blame.

But if one wets his head,

He loses it, in truth.⁶⁸

上九譯文在字句次序上也經過重整安排。原文之意為：至誠安於義命而飲酒自樂，則可無咎；若放縱而不知節制，竟至於作長夜之飲，沈緬於酒色，將如狐渡河滅頂，如人飲酒溺缸，雖自信於中，亦失其宜。⁶⁹ 譯文“*There is drinking of wine*”“*In genuine confidence.*”是原文「有孚于飲酒」的倒裝句。「濡其首，有孚失是」在漢語「意合」的結構判斷上，是與前句「有孚于飲酒，无咎」相對稱的(contrasted)；是以它的轉折語「但是」和條件詞「如果」是「無言而能理解」的。可是在英語結構裡，若要表示相同的情境，“but”和“if”是不能免的。所以，“*But if one wets his head, / He loses it, in truth.*”可視為漢文的「順譯」，也符合受語裡字句次序安排的「譯文常規」。

四、直譯與意譯

直譯與意譯的討論一直是古今中外的議題，可從中外學者和譯者從事經典翻譯的歷史裏看出這議題的永恆性和不定性。由於余光中學貫中西，在他的翻譯論述裏，旁徵博引過許些歷史上重要的翻譯家和翻譯思維，諸如釋道安、鳩摩羅什、玄奘、梵漢譯音、譯字、翻譯道場、嚴復、林語堂、梁實秋等，還有從希伯來文翻譯舊約、傑羅姆、英王詹姆斯欽定本聖經(The Authorized Version)，以及諸多現代的西方譯者等等。⁷⁰ 這些人或事都在翻譯演進上與所謂「直譯」和「意譯」的詮釋及選擇有直接關係。因此筆者在

⁶⁷ 見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頁 924。

⁶⁸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718。

⁶⁹ 見黃忠天：《周易程傳註評》，頁 562。

⁷⁰ 見《余光中談翻譯》一書，如〈論中文之西化〉、〈翻譯乃大道〉、〈作者，學者，譯者〉。《舉杯向天笑》一書中〈創作與翻譯〉、〈翻譯之教育與反教育〉、〈翻譯之為文體〉、〈虛實之間見功夫〉等篇章。

此約略回溯，期望能勾勒「余學」的淵源。

根據可考者，中國佛經翻譯史從東漢桓帝時西域安息王國太子安世高始，約從西元一四八年到一一一一年，歷經四個重要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代表人物提出翻譯的見解。簡述如下，第一階段的安世高通曉華語，但較偏直譯。第二階段的釋道安(314-385)，會先對「同本異譯」進行比較研究，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主張翻譯梵文時「必須改從漢語譯法」、有時也「不得不加以刪削」、認為要傳達古代聖人微言大義等面向是很不易。第二階段還有鳩摩羅什(350-409)他也通漢語，採「意譯」法，但用梵文本來校對譯文，文字質量精美。第二階段的法顯(約 334-420)是中國第一位到印度去的人，苦學梵文，譯戒律。第三階段為佛教的全盛期，唐太宗時的玄奘(600-664)為代表人物，他精通梵文、深通佛理，漢語程度又好，改進譯場流程與制度；玄奘的翻譯在「文」(意譯)、「質」(直譯)之間拿捏穩妥，若與鳩摩羅什相較，則「直」了些。第四階段以宋太宗時的贊寧(919-1001)為代表，對譯音或譯字、何種文體可用直譯、何種可用意譯，都有分析；贊寧最著名的翻譯比喻為桔與枳換土而植，「桔化為枳，桔枳之呼雖殊，而辛芳幹葉無異。」

71

西方聖經有舊約的希伯來文原文、新約的希臘文原文等，輾轉翻譯為拉丁文，再翻成現代諸多西方語文譯文。在可歌可泣的歷史中，有數位重要翻譯家：傑羅姆(St. Jerome, c. 331-c.420)曾到伯利恆，是第一位把希伯來文舊約翻譯成拉丁文者，稱 The Vulgate，雖然他的譯文使用了一些不為傳統教會人士熟悉的語彙而遭到奧古斯汀(Augustine)反對，卻被羅馬天主教會採用為官方版本，使用了好幾世紀⁷²；德國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因採用日常媽媽在廚房、小孩在街頭的用語而與教廷衝突，甚至寫了一篇措詞激烈的文章〈論翻譯的公開信〉(An Open Letter on Translating)回敬教會人士⁷³；一三八二年第一本英文聖經的譯者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31-1384)主張用方言譯聖經，促進了英文散文的發展，在「直譯」、「意譯」之間，又因為主張教會和國家需分離而治，遂遭挖屍、焚燒、丟入河裡殉道，此等翻譯事蹟不一而足。⁷⁴

到了近代，西方學者為了解決「直譯」、「意譯」之爭的歷史困境，先有德國神學家

⁷¹馬祖毅等著：《中國翻譯通史：古代部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65-122。

⁷²Jean Delisle, and Judith Woodsworth, "The Spread of Religions" in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5)166-69.

⁷³Martin Luther, "An Open Letter on Translating," trans. Gary Mann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8).

⁷⁴Jean Delisle, and Judith Woodsworth, "The Spread of Religions" in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5) 173.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 – 1834)，站在詮釋學的立場，就「以翻譯者為中心」(translator-centered)或「以作者為中心」(author-center)作探討，他較偏向移樽就教去「遷就作者」⁷⁵；又有一九七二年荷姆斯(James Holmes)發表了翻譯史上分水嶺之作〈翻譯學的名稱和性質〉(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對翻譯學提初三大方向：描述翻譯學(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理論翻譯學(Theore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和應用翻譯學(Applied Translation Studies)。⁷⁶ 之後，翻譯學朝向獨立學門邁進，多樣翻譯模式接踵而出，不一一列舉。比如勒非弗爾(Andre Lefevere)論述翻譯中意識形態運作的現象；奈達(Eugene Nida)從「形式對等」(formal equivalence)、「功能」(functionalism)去探索，提出實際效力的「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和「趨近」(approximation)論；雷斯(Katharina Reiss)從功能論的觀點將文本分為四類：訊息類(informative)、表意類(expressive)、訴請類(operative)和視聽類(audio-media)，而採適用的翻譯方法，走入「文本類型」(text type)理論；賀爾茲-曼塔里(Justa Holz-Mänttari)的(translatorial action)分析翻譯家和翻譯產品製作、銷售者的合作行為，以滿足受語讀者的市場需求；弗每爾(Hans J. Vermeer)的「目的理論」(skopostheory)；文努迪(Lawrence Venuti)提出「譯者角色的隱形」(translator's invisibility)的警告，認為翻譯者有時過度遷就受語的讀者和文化，而過度隱匿自己的角色等的翻譯理論研究。另有跨越了語言學的藩籬，從文化符號和功能視角做「語言之外」(extra-linguistic)的符號詮釋，如巴斯內特(Susan Bassnett)⁷⁷、貝克(Mona Baker)以〈反抗運動中翻譯〉(Translation in Protest Movements)為主題，運用翻譯文本做社會、族群意識衝突觀點的檢視。⁷⁸

我國清朝迄今，如乾隆一七三九年考取翻譯進士科的魏象乾在《繡清說》裡就提出翻譯不能「失正」；馬建忠(1845-1900)呈〈擬設翻譯書院議〉給朝廷時，就舉出「善譯」論點，謂「夫而後，能使閱者所得之益與觀原文無異」的閱讀等效論觀點，較之今日西方的學界視野不遑多讓。⁷⁹ 近代學者嚴復標舉譯事三難「信達雅」，此三字就是按翻譯面向的難度依序排列。一九六七年趙元任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講座提出〈論翻譯中信、達、

⁷⁵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28-29.

⁷⁶James S. 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4)180-192.

⁷⁷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Methuen, 1980) 13-29.

⁷⁸Mona Baker, "Translation in Protest Movements," *The 1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each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 May 23, 2015.

⁷⁹見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年)，頁64-91。

雅的信的幅度〉(Dimensions of Fidelity in Translation)對「信」的幅度做多面向的評量(如字的意義與上下文的關係、意義跟功用的結合、直譯[細顆粒的翻譯]和意譯[粗顆粒的翻譯]的近似度、字句在原文出現的頻率、符號轉換的考量、詞品是否必須相當、單複數量詞、譯文體裁年代相不相當、語言音調、語言使用的場合等等)；誠然，如果依趙元任列舉的「信的幅度」各層面來進行翻譯，其結果一定如嚴復所下結論：「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所以趙元任還是傾向翻譯時，若「意譯」與「功用」兩方面能結合，會是最理想的翻譯結果，他說：「要是的話，那麼意譯最合[場合]的翻譯也是最用得上的翻譯。」⁸⁰ 林語堂認為「絕對忠實之不可能」，他將「忠實標準」分為四等，就是「直譯」、「死譯」、「意譯」和「胡譯」，並說「忠實非字字對譯之謂」，而是要活著看各字在句中的連貫意譯，提倡「活的字義觀」，而非「死的字義觀」，「譯者須完全根據中文心理... 無論何者語體於未經『國化』以前都是不通的」，林語堂在翻譯技術層面上是採「譯文須以句為本為。」⁸¹ 而余光中為上述學者的晚輩，同樣浸淫在中西方文化傳統裏，論翻譯，他對意義、形式和功能有如下的看法：

(一) 要譯原意，不要譯原文。

這是余光中做為譯者一向的原則。只顧表面的原文，不顧後面的原意，就會流於直譯、硬譯、死譯。最理想的翻譯當然是既達原意，又存原文。退而求其次，如果難存原文，只好逕達原意，不顧原文表面的說法了。⁸²

(二) 兩相妥協的兩全之計。

有人說：「翻譯如叛逆。」有人說：「翻譯是出賣原詩。」有人說：「翻譯如女人，忠者不美，美者不忠。」余光中卻以為翻譯如婚姻，是一種兩相妥協的藝術。原作者是神靈，則譯者就是巫師，任務是把神的話傳給人。譯者介於人神之間，既要通天意，又得說人話，真是「左右為巫難」。讀者只能面對譯者，透過譯者的口吻，去想像原作者的意境。翻譯實在是一種信不信由你的「一面之詞」。⁸³

(三) 譯文在讀者心中喚起的反應，應與原文喚起者相同。⁸⁴

譯者追求「精確」，原意是要譯文更接原文，可是不「通順」的譯文令人根本讀不下去，

⁸⁰ 見趙元任：〈論翻譯中信、達、雅的信的幅度〉，《翻譯論集》，劉靖之編，頁 48-63。

⁸¹ 見林語堂：〈論翻譯〉，《翻譯論集》，劉靖之編，頁 32-47。

⁸² 見余光中：〈與王爾德拔河記〉，《余光中談翻譯》，頁 126。

⁸³ 見余光中：〈變通的藝術—思果著《翻譯的研究讀後》〉，《余光中談翻譯》，頁 55。

⁸⁴ 雪萊為自己的翻譯訂了一個原則：「譯文在讀者心中喚起的反應，應與原文喚起者相同。」見余光中：〈作者、學者、譯者〉，《余光中談翻譯》，頁 176。

怎能接近原文呢？不「通順」的「精確」，在文法和修辭上已經是一種病態。要用病態的譯文來表達常態的原文是不可能的。理論上說來，好的譯文給譯文讀者的感覺，應該像原文給原文讀者的感覺。⁸⁵

（四）譯文要調和兩種語文的特色。

譯者既要照顧原文，保其精神，還其面目；也要照顧譯文，不但勸其委婉迎合原文，還要防其在原文壓力之下太受委屈，而至面目全非。以旗與風的關係為喻：譯文是旗，原文是風，旗隨風而舞，是應該的，但不能被風吹去。這就要靠旗杆的定位了，旗杆，正是譯文所屬語文的常態底限，如果逾越過甚，勢必杆摧旗颺。⁸⁶

（五）中文省去的部分，譯者必須善加揣摩。

中國古典英譯之難，往往不在有形的詞句，而在無形的文法。中國詩裡省去主詞的「無頭句」，令譯者猜測為難。譯者要能妥為填補。⁸⁷

翻譯要直譯還是意譯？是死的譯法還是具生命力的譯法？英譯《易經》能否保存《易經》的原意？譯文在讀者心中喚起的反應，與原文喚起者是否相同？我們從前面提到的幾本《易經》英譯的版本，依其目的和功能，對每一個卦都有不同的詮釋。例如 Brian Browne Walker 的《易經》(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著眼於易經的占卜功能，重在運用的詮釋，自然與原意的文字、意象和風格相距甚遠。華裔黃濬思英譯的《易經全集》(The Complete I Ching)，旨在還原「正統中國思想」，翻譯方法上採用孔子的「述而不作」(narrate, don't write)，文體上遵循魯迅的「寧信不達」(better to stick to the truth than make the translation smooth)⁸⁸，並在〈緒言〉(Preface)提到：「最理想的翻譯應該是以英文的形式，表達中國的本質。」(The ideal translation should be English in form, but Chinese in essence.)⁸⁹ 黃氏的企圖就是：「譯文在讀者心中喚起的反應，應與原文喚起者相同。」其實，這個翻譯概念在十八世紀末愛丁堡的學者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3)在他的名著《翻譯原理論》(the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中，描述所謂「好的翻譯」(a good translation)定義時就有此閱讀等效的主張。⁹⁰

⁸⁵ 見余光中：〈變通的藝術—思果著《翻譯的研究讀後》〉，《余光中談翻譯》，頁 56。

⁸⁶ 見余光中：〈作者、學者、譯者〉，《余光中談翻譯》，頁 176。

⁸⁷ 見余光中：〈廬山面目縱橫看〉，《余光中談翻譯》，頁 76。

⁸⁸ Alfred Huang, "About the Translation," in *The Complete I Ching*, p. xxvii-xxviii.

⁸⁹ Alfred Huang, "Preface," in *The Complete I Ching*, p. xvii.

⁹⁰ Alexander Fraser Tytler, *the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1978) 13-16。泰特勒這本書被視為西方第一部有系統的翻譯理論論述。

衛禮賢/貝內斯的《易經》英譯本以清朝大學士李光地所撰的《周易折中》為原文範本，所謂折中即兼採程頤、朱熹的《易經》注疏—《易程傳》、《周易本義》再加上自己的按語。仔細分析衛氏英譯本，可發現在卦辭（the Judgment）、爻辭（the Lines）、彖辭（Commentary on the Decision）、大小象辭（the Images）、序卦（The Sequence）、雜卦（Miscellaneous Notes）等《周易》本經部份，基本上以直譯為主，屬於忠實的翻譯；而在各家注疏的部份，衛禮賢/貝內斯則採釋義(paraphrase)，有了活潑的譯法，並不詳列那一家說法，而是綜合論述，甚至蘊含個人的易學思想在內。試以〈彖辭〉和〈大象辭〉原文與英譯文對照比較如下：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⁹¹（〈既濟〉卦彖辭）

Commentary on the Decision

“AFTER COMPLETION.Success.” In small matters there is success.

“Perseverance furthers.” The firm and the yielding are correct, and their places are the appropriate ones.

“At the beginning good fortune”: the yielding has attained the middle.

If one stands still at the end, disorders arise, because the way comes to an end.⁹²

在卦名〈既濟〉的詮釋上衛禮賢/貝內斯用“AFTER COMPLETION”與黃濬思的英譯“Already Fulfilled”有差異。黃氏從周朝的歷史內涵來解讀，強調「使命」的實踐，認為此〈既濟〉卦代表商朝已經完成使命了；〈既濟〉之後，接著最後第六十四卦〈未濟〉(BEFORE COMPLETION)是一個新的循環開始，代表周朝的使命正要開始，尚未完成(Not Yet Fulfilled)。⁹³ 不過，“completion”和“fulfilled”雖然有“名詞”和“過去分詞”的差異，但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所指涉的東西或動作都已經「完成」。這是屬於對漢文「原意」詮釋的爭議，不是能否譯出或保留「原意」的問題，更非是否忠於「原文」的問題。

此段第六十三卦〈既濟〉彖辭的英譯文能保留「原意」，除了英語結構上不能避免的

⁹¹ 見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頁 907-908。

⁹²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710。

⁹³ Alfred Huang, “Ten Contributions,” in *The Complete I Ching*, p. xxii-xxiii.

表示條件子句的“if”，表示因果子句的“because”等意者必須妥協的地方外(因為這些字在古漢語裡是「無言而能理解的」)，衛禮賢/貝內斯沒有用「逆譯」法，也照顧到譯文字句盡量趨近「原文」字句安排的次序；因此在形式與內容上，譯文能稱職地調和兩種語文的特色；讀者閱讀此段英譯文時，所感受到的流暢與閱讀漢語原文時相當，可謂好的翻譯。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⁹⁴ (〈既濟〉卦大象辭)

THE IMAGE

Water over fire: the image of the condition

In AFTER COMPLETION.

Thus the superior man

Takes thought of misfortune

And arms himself against it in advance.⁹⁵

此段〈既濟〉卦大象辭的英譯，衛禮賢/貝內斯添加了字詞，如“the image of condition”(情境之象)來補充、幫助受語讀者理解這是〈既濟〉(AFTER COMPLETION)時之情況，副詞“thus”承接前因的轉折字，還有結構上必須妥協的反身代名詞“himself”特色，整體譯文內字句次序的安排與思惟的進展與漢文原文相平行。若把英譯文再回譯為漢語，大抵上文意相差不大。衛禮賢/貝內斯譯了「原意」，風格上也樸實暢達。雖然達到余光中所謂的「最佳字句排最佳次序」的要求；然而原文畢竟是典雅的文言，譯文為現代英文，「原意」雖譯出了，卻缺了漢文精鍊本色的無窮蘊味。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未濟〉卦象辭)

Commentary on the Decision

⁹⁴ 見清·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頁 909。

⁹⁵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710-711。

“BEFORE COMPLETION. Success.” For the yielding attains the middle.

“The little fox has nearly completed the crossing”: he is not yet past the middle.

“He gets his tail in the water. There is nothing that would further.” Because the matter does not go on to the end.

Although the lines are not in their appropriate places, the firm and the yielding nevertheless correspond.⁹⁶

此段〈未濟〉卦象辭的英譯文，像「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等與其卦辭譯文重複部分，不再分析。但同樣可發現，衛禮賢/貝內斯的英譯裏，思惟次序的排列，也與漢文原文亦步亦趨，迎合原文，且文筆清晰暢達。惟有三點可討論：第一、漢語原文「未出中也」的「出」是動詞，由副詞「未」來修飾，其受詞為「中」。衛禮賢/貝內斯採用了「be 動詞+否定副詞+介係詞」(is not past)的結構，有弱化動作之嫌。第二、依標準英文語法，除了在非正式的口語上，從屬連接詞“Because”引出的子句很少能獨立成句，像“Because the matter does not go on to the end.”第三、在漢語原文句構裏，「雖不當位」的主詞「爻」是可從上下文意判斷出的「無言而能理解」(understood)的內鍵結構，但在英文當中，的確需點出「主詞」(爻：lines)。衛禮賢/貝內斯的英譯兼顧並調合了漢英語言的特色，如余光中所謂：「譯文要調和兩種語文的特色。譯者既要照顧原文，保其精神，還其面目；也要照顧譯文，不但勸其委婉迎合原文，還要防其在原文壓力之下太受委屈，而至面目全非。」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未濟〉卦大象辭)

THE IMAGE

Fire over water:

The image of the condition before transition.

Thus the superior man is careful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ings,

So that each finds its place.⁹⁷

⁹⁶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715。

⁹⁷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716。

此〈未濟〉卦象，火居水上，依水向下流，火向上竄的屬性；水火不會有交流，事難成；此與〈既濟〉卦正相反。和〈既濟〉卦的譯法相同，衛禮賢/貝內斯增加了一行“The image of the condition before transition.”(變遷前情境之象)給受語讀者做情境說明。可是情境主控語“BEFORE COMPLETION”卻漏譯了。此段英譯文，雖然思惟次序的排列，也與依漢文，文筆清晰，可是英譯的句構加上成接前因的轉折副詞“Thus”和表示想望的連接詞“so (that)”帶出一個子句，因此語氣就顯得冗長，未若「中文好用短句」之簡潔有力特性。⁹⁸ 此漢語原文「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實為一「兼語句/詞組」⁹⁹：主詞「君子」加上動詞「辨」加上受詞「物」；同時「物」又成了下一句的主詞，動詞為「居」加上受詞「方」。其實，這是雙語間表達的妥協藝術之一例。余光中曾把譯者比喻為「巫人」居於神(原作者)、人(受語讀者)之間，實則，翻譯如婚姻，是一種兩相妥協的藝術。¹⁰⁰

在〈既濟〉和〈未濟〉兩卦「爻辭」和「大象」裡，有幾個漢字詞特別具有中國文化的涵義，諸如「君子」、「小人」和「高宗」，在翻譯時也特別會引起興趣。「君子」、「大人」(the great man)見〈乾〉卦¹⁰¹，通常和「小人」相對。根據香港商務印書館的《漢英詞典》：「君子」：gentleman, a man of noble character；「大人」：adult, Your/ His Excellency；「小人」：a person of low position, a base/ mean person, a villain, a vile character。¹⁰² 偉利(Arthur Waley, 1889-1966)在《孔子論語》(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譯本裡對「君子」有如下之分析：首先他是君王或各國統治者的兒子；再者，「君子」不僅指出生身分，還有道德舉止上的要求，所謂「謙謙君子」，符合西方傳統“gentleman”的概念；而「小人」則指“small people,”也就是 common people。¹⁰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偉利英譯：“The Master said, A true gentleman is calm and at ease; the Small Man is fretful and ill at ease.”¹⁰⁴ 偉利還特別用大寫來標出「小人」。「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偉利仍舊使用同樣的字來譯「君子」與「小人」：“A gentleman who has studied the Way will be all the tenderer towards his fellow-men;

⁹⁸ 見余光中：〈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余光中談翻譯》，頁 164。

⁹⁹ 見胡裕樹主編：〈詞組和句法分析〉，《現代漢語》，頁 304。「兼語詞組」：一個動賓詞組和一個主謂[主語+動詞+受詞/補語]詞組套在一起，動賓詞組的賓語兼做主謂詞組的主語。

¹⁰⁰ 見余光中：〈變通的藝術—思果著《翻譯的嚴就讀後》〉，《余光中談翻譯》，頁 55。

¹⁰¹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373。

¹⁰² 見吳景榮主編：《漢英辭典》(*The Pinyi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香港：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年)。

¹⁰³ Arthur Waley, “Terms”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34-5.

¹⁰⁴ Arthur Waley, “Book VII”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p. 131.

a commoner who has studied the Way will all the easier to employ.”¹⁰⁵ 但在〈陽貨篇〉篇中，孔子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此處「小人」是指家中的僕役，非指心術不正的人；偉利用「出生」來詮釋「小人」(people of low birth)，全句譯文如下：“Women and people of low birth are very hard to deal with.”¹⁰⁶

但是理雅各將「君子」譯成“superior man”，「小人」譯成“mean man/ small mean people”。¹⁰⁷ 然而理雅各對「君子」與「小人」的譯法也非完全固定，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篇〉，譯成“When the man of high station is well instructed, he loves men; when the man of low station is well instructed, he is easily ruled.”

「君子」“man of high station”與「小人」“man of low station”。¹⁰⁸ 這裏的“station”指的是社會地位(social standing, position, rank)。「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小人」，理雅各以僕役(servants)來解釋「小人」；此句他英譯為：“Of all people, girls and servants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behave to.”¹⁰⁹

《易經》是儒家思想的典範，在〈既濟〉和〈未濟〉兩卦「爻辭」和「大象」中，衛禮賢/貝內斯、黃濬思、閔福德諸人對「君子」與「小人」的詮釋和英譯，大抵都在上述範圍內。茲摘要如下：衛禮賢/貝內斯的英譯：君子(Thus the superior man/ takes thought of misfortune)；小人(inferior people must not be employed)。¹¹⁰ 黃濬思：君子(The superior person. . . takes preventive measures against possible decline)，黃濬思此處用“petty fellows”強烈貶抑小人：(petty fellows should not be used)。¹¹¹ 閔福德：君子(The True Gentleman)，小人(No room here for a Small man)。¹¹²

至於，「高宗」一詞是中國歷代王朝皇帝死後，依其在世功過，追謚的廟號之一，並非每位皇帝駕崩後都能配廟號。類似的廟號有「太祖」、「睿宗」、「玄宗」、「思宗」、「哀宗」等。此卦「高宗」為敬稱商代之王武丁，而這些英譯文中，只有前輩理雅各的英文翻譯將中國古禮的內涵道出來。理雅各除了用羅馬拼音“Kao Zung”把「高宗」拼出來，又補足了漢語原意：“the sacrificial title of Wu Ting, . . . of the Shang dynasty (B.C.

¹⁰⁵ Arthur Waley, “Book VII”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p. 210.

¹⁰⁶ Arthur Waley, “Book VII”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p. 217.

¹⁰⁷ James Legge, trans. *The Four Books* (Hong Kong: Wei Tung Book Store, 1971) 56, 158.

¹⁰⁸ James Legge, trans. *The Four Books*, 153-54.

¹⁰⁹ James Legge, trans. *The Four Books*, 163.

¹¹⁰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 711-12.

¹¹¹ Alfred Huang, *The Complete I Ching*, p. 487.

¹¹² John Minford, “Book of Wisdom” in *I Ching: The Essential Transl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Oracle and Book of Wisdom*, p. 483, 486.

1364-1324)”。¹¹³ 英文字 “Ancestor” 大體上指祖先，通常都指“過世”的人；衛禮賢/貝內斯英譯用大寫字母 “The Illustrious Ancestor” 表達「高宗」(The Illustrious Ancestor Disciplines the Devil’s Country.)¹¹⁴，反而不如閔福德用 “The High Ancestor” (The High Ancestor Attacks Demon Territory)¹¹⁵，更貼近漢語，雖然 “high”，“illustrious” 都有崇敬、彰顯之意。但這種譯文屬於圈內人的做法，一般讀者大概對這種語言符號的「所指」(signified)會感覺疑惑。而黃濬思採 “Emperor Gao Zong” (Emperor Gao Zong attacks the Gui Fang)¹¹⁶，以官銜加上拼音來表述，為目前漢學研究裡提到中國歷代君王時的書寫慣例，即符合前面說的「譯文常規」。由「高宗」一詞的英文翻譯，即清楚地看到異語間「接枝」(grafting)的現象，正如余光中比擬翻譯如婚姻，是一種兩相妥協的藝術。

五、自揚漢聲

前面提及余光中認為中國古典英譯之難，往往不在有形的詞句，而在無形的文法，中文省去的部分，譯者必須善加揣摩，才能妥為填補。¹¹⁷ 除漢英語法的差異之外，跨文化背景的意象，尤其是帶有深刻歷史典故的引喻(allusion)或換喻(metonymy)類，像問鼎、桃園結義、高宗、三昧、鬚眉、紅顏、肝膽和手足等，雖國人已習以為常，但要求西方譯者「取其意而遺其形，實在很難。」中國古典作品的英譯，先天上已經難關重重，不易討好。最理想的譯法，應該是中外的學者作家兩相合作，中國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人英文的表達力，當可無往不利。¹¹⁸ 英美學者譯中國文學，好處是踏實，不輕易放過片言隻字，缺點往往也就在這裏，由於字字著力，反而拘於字面，錯呢不能算錯，可惜死心眼兒。¹¹⁹ 因此在漢學英譯這一區塊，英美學者已經貢獻不少，該是中國學者自揚漢聲的時候了。¹²⁰ 臺灣的蔣經國基金會資助了海內外漢學家英譯中國經典，貢獻卓著；北京的外文出版社持續不斷地出版從先秦迄今的中國典籍之外文譯著；國立台灣文學館和今日的文化部也獎助台灣的小說、詩歌、原住民文學、女性研究、文化研究、

¹¹³ James, Legge. *The Book of Changes*, p. 122.

¹¹⁴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 712.

¹¹⁵ John Minford, “Book of Wisdom” in *I Ching: The Essential Transl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Oracle and Book of Wisdom*, p. 486.

¹¹⁶ Alfred Huang, “Ten Contributions,” in *The Complete I Ching*, p. 487.

¹¹⁷ 見余光中：〈廬山面目縱橫看〉，《余光中談翻譯》，頁 76。

¹¹⁸ 見余光中：〈廬山面目縱橫看〉，《余光中談翻譯》，頁 66。

¹¹⁹ 見余光中：〈廬山面目縱橫看〉，《余光中談翻譯》，頁 72。

¹²⁰ 見余光中：〈廬山面目縱橫看〉，《余光中談翻譯》，頁 81。

等多國譯文選集在國外出版。¹²¹ 一九九六年由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編輯、美國諾騰出版社印行的《中國文學選集：初始至一九一一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¹²²，堪稱當今漢學研究的巨著。而一九九八年由中國學者撰寫歷代中國作者英文簡介，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編著兩巨冊《印地安那版傳統中國文學手冊》(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¹²³，已見證了本國學者對西方漢學界的揚聲了。

在西方的《易經》研究上，非中國學者的著作已不少，其翻譯目的也各不同，已在前言中提過，但黃濬思有感於「等不到一本可正確傳達正統中國思想的《易經》英譯本」¹²⁴，遂自己動手翻譯，並於二零一零年出版這本英譯的《易經全本》(The Complete I Ching)，內含孔子《十翼》(Ten Wings)的英文翻譯。黃氏翻譯的方法和觀念已敘明於前：「最理想的翻譯應該是以英文的形式，表達中國的本質。」他的朋友稱許並期望它成為繼衛禮賢標準本之後，下一個五十年的標準本。¹²⁵ 由此看來，自揚漢聲，由華人自譯中國經典已開始播種，希望未來有更多人投入，以蔚為園林。

六、結語

本文初步選出《易經》中的〈既濟〉和〈未濟〉兩卦的英譯，從余光中的翻譯理論和實踐方法，來分析並評量衛禮賢/貝內斯的英譯文本，從漢英語法的結構、文化內涵上，逐一剖析。務期在《易經》英譯這一方園地，貢獻足資參考借鏡的典範，以期響應余光中「自揚漢聲」的理念和方向，為國人自譯古典經學，獻帛薄之力。

《易經》彷如西方的《聖經》，卻沒有神的權威色彩，衛禮賢/貝內斯稱之為智慧之書(The Book of Wisdom)。數千年來，藉由它的占卜、更多的是生活智慧，幫助歷代中國人渡過戰亂遷徙、個人榮辱、富貴貧賤的遭遇，也培養了人們天人合一、樂天知命的人生哲學，無論順逆，皆相信否極泰來並居安思危。而透過《易經》的優質翻譯，讓西方人也能分享中國遠古流傳下來的智慧，為西方文化注入一股調合的活水。

¹²¹ 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外譯中心：《臺灣文學外翻譯書目題要(1990-2011)》，(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

¹²² Stephen Owen,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New York: W.W. Norton, 1996).

¹²³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¹²⁴ Alfred Huang, "Preface" in *The Complete I Ching*, p. xviii.

¹²⁵ Alfred Huang, "Acknowledgments" in *The Complete I Ching*, p. xiii.

上一世紀以來，隨著電子科技的即速進展，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勢不可擋，過去東方尤其中國，總被外人視為神秘之土，文化深邃難以理解，如何深入並相互了解，很大的功勞在於翻譯。這「嚼飯與人」的功夫若上乘，人類智慧彼此水乳交融，甚至可能擷長補短，形成很大的影響；反之，造成誤解，永遠溝壑難平，相見不識，危害匪淺。余光中先生說：「翻譯原是一種『必要之惡』，一種無可奈何的代用品。」¹²⁶ 是以，如何將這「惡」變成「善」，是從事翻譯者該戮力的目標，亦是筆者對《易經》的英譯文本，做嘗試性探索的初衷。

¹²⁶見余光中，〈翻譯和創作〉，《余光中談翻譯》，頁 36。

參考文獻

一、專書

1. 王弼：《周易略例》，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年。
2. 王弼、晉·韓康伯：《周易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年。
3. 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2006年。
4.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一卷》，臺北市：藍燈文化，1991年。
5. 成中英：《易學本體論》，臺北縣新店：康德，2008年。
6. 余光中：《含英吐華：梁實秋翻譯獎評語集》，臺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
7. 余光中：《余光中談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
8. 余光中：《舉杯向天笑》，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
9. 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臺南：中華易道心法文化協會出版，2008年。
10. 呂紹綱：《周易辭典》，臺北：漢藝色研，2001年。
11. 吳怡：《易經繫辭傳解義》，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
12. 吳景榮主編：《漢英辭典》(The Pinyi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香港：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年。
13. 林語堂：〈論翻譯〉。《翻譯論集》。劉靖之編。臺北：書林出版社，1995年。
14. 胡裕樹主編：〈詞組和句法分析〉。《現代漢語》。重訂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
15. 柯平編著：《英漢與漢英翻譯》，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6年。
16. 馬祖毅等著：《中國翻譯通史：古代部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17. 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年。
18. 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外譯中心：《臺灣文學外翻譯書目題要(1990-2011)》。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年。
19. 黃忠天：《周易程傳註評》，高雄：復文出版，2006年。
20. 趙元任：〈論翻譯中信、達、雅的信的幅度〉。《翻譯論集》。劉靖之編。臺北：書林出版社，1995年。
21. 趙曉陽：〈傳教士與中國國學的翻譯——以《四書》《五經》為中心〉，《中國近代研究》，

2005 年 09 月 14 日，閱網 2015 年 5 月 31 日，<<http://jds.cass.cn/Item/433.aspx>>.

22. 賴貴三：〈易學東西譯解同〉，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16 期，2014 年 9 月。

23. 嚴復：〈天演論譯例言〉。《翻譯論集》。劉靖之編。臺北：書林出版社，1995 年。

二、外文專書 (References)

1. Anthony, Carol K. *A Guide to The I Ching*. Massachusetts: Anthony Publishing Co., Inc., 1988.
2. Baker, Mona. "Translation in Protest Movements," *The 1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each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wan, May 23, 2015.
3.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Methuen, 1980.
4. Wilhelm/Baynes.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5. Cleary, Thomas. *I Ching: The Book of Change: A Complete & Unabridged Translation*. Boston & Lond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1992.
6. Delisle, Jean, and Judith Woodsworth. "The Spread of Religions" in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5.
7. Holmes, James 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4.
8. Huang, Alfred. *The Complete I Ching*. Rochester and Toronto: Inner Traditions com., 2010.
9. Legge, James. *The Book of Changes*. Lavergne, TN: March 09, 2015/ CPSIA:LVOW03s0407090315.
10. Legge, James, trans. *The Four Books*. Hong Kong: Wei Tung Book Store, 1971.
11. Luther, Martin. "An Open Letter on Translating." Trans. Gary Mann.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8.
12. Minford, John. *I Ching: The Essential Transl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Oracle and Book of Wisdom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Com., 2014.
13. 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4. Nienhauser, William H. Jr.,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 Owen, Stephen.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New York: W.W. Norton, 1996.

16. Ritsema, Rudolf, and Stephen Karcher. *I Ching*. New York: Element Books Ltd., 1994.
17. Toury, Gideon.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orms in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Ed.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4.
18. Tytler, Alexander Fraser. *The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1978.
19. Waley, Arthur. "Terms"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20. Brian Browne Walker.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